

中央民族大学“985工程”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化教育与边疆史地研究创新基地文库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丛书

总主编◎戴庆厦


到田野去

——语言学田野调查的方法与实践

DAO TIAN YE QU

——YU YAN XUE' TIAN YE DIAO CHA
DE FANG FA YU SHI JIAN

戴庆厦 罗仁地 汪 锋 ◎ 主编

 民族出版社

中央民族大学“985工程”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化教育与边疆史地研究创新基地文库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丛书

总主编◎戴庆厦

到田野去


——语言学田野调查的方法与实践

DAO TIAN YE QU

——YU YAN XUE TIAN YE DIAO CHA

DE FANG FA YU SHI JIAN

戴庆厦 罗仁地 汪 锋 ◎ 主编

 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到田野去: 语言学田野调查的方法与实践/戴庆厦, 罗仁地, 汪锋主编.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8. 12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化教育与边疆史地研究创新基地文库·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丛书)

ISBN 978-7-105-09904-7

I. 到… II. ①戴… ②罗… ③汪… III. 语言学—文集
IV. H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95847 号

(上编) The original texts were published in the magazine Sprachtypologie und Universalienforschung, Language Typology and Universals, Volume 60 (2007) Issue 1. © 2007 by Akademie Verlag GmbH, Berlin

到田野去——语言学田野调查的方法与实践

主 编: 戴庆厦 罗仁地 汪 锋

策划编辑: 欧光明

责任编辑: 杨蜀艳

出版发行: 民族出版社

网 址: www.mzchs.com

地 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 码: 100013

印 刷: 迪鑫印刷厂

版 次: 2008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001-1500 册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5.75

字 数: 24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105-09904-7/H·682 (汉 199)

定 价: 3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投稿热线: 010-64228001; 发行部电话: 010-64211734)

编者序

F. Boas 和 E. Sapir 等学者或许是开始系统的田野语言学调查的先驱。那时候还冠以语言人类学 (Linguistic Anthropology) 的名义, 而今天, 田野语言学 (Field Linguistics) 已经以独立的身份步入了大学课堂。鲜活的田野语言持久地冲击着语言学家的想像力, 也构成了语言学理论的不竭的源泉。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 生活着丰富多彩、文化各异的族群, 他们灿烂思想和珍贵的文明遗产都凝聚于他们的语言之中。异彩纷呈的鲜活语言在中国的山川田野中无处不在。一方面, 这些丰富的共时语言矿藏显示着他们在世界语言之林的独特地位; 另一方面也与中国数千年汇聚而来的浩瀚文献相映成辉。活生生的语言展示着人类思维表达之精巧, 也与数千年的语言传统相衔接。但我们不能不关注的是, 中国的语言多样性同样在流失。一些弱势语言在经济、文化的巨大压力下已经开始濒危、消亡, 这是一个令人痛心的严峻形势。

我们以此专题呼吁: 到田野去。

令人稍感欣慰的是, 对于语言田野的调查越来越引起各方面的关注, 关于田野调查的方法与实践都正源源不断地汇集起来。澳洲拉筹伯大学语言类型学研究中心的 Alexandra Y. Aikhenvald 最近为 “*Sprachtypologie und Universalienforschung*” 编辑了一期关于田野调查的专辑, 其中的经验来自于诸多对亚洲读者来说比较陌生的语言地带, 诸如亚马逊热带丛林的语言、尼日利亚的非洲语言等等。所谓 “他山之石, 可以攻玉”, 我们组织翻译了其中几篇, 以开拓我们的视野。在此, 我们也要感谢 Aikhenvald 教授愿意提供中文翻译许可, 也要感谢各位译者的辛勤工作。

同时, 在汉藏语区, 语言学家们多年的辛勤耕耘也积累了丰富的田野调查知识。汉语方言调查有长久的传统, 民族语言调查也经过了

2 || 到田野去——语言学田野调查的方法与实践

近百年的积累，而今电子计算机技术也广泛应用到田野调查当中，这都使得今天和将来的语言学田野调查能具有更广更深的维度。

黄布凡教授主编的《藏缅语族语言词汇》应用广泛，其中的词汇表对藏缅语等语言的调查有重要参考价值，故列为附录；黄行教授为我们提供了语法例句参考，为本文集增色不少，谨此对二位教授一并致谢。

为本文集撰文的各位语言学家，每个人都几乎把自己的主要精力放在田野调查上了，这么多年来锲而不舍地丰富着田野语言学的理论和实践。我们希望本文集能给有志于田野语言学的建设者们一些启迪。

目 录

编者序

/1

上 编

语言学田野调查：代序

(Linguistic Fieldwork: Setting The Scene)

Aikhenvald, Alexandra Y. [吴君如 译] /1

田野语言学：微型手册

(Fieldwork: A Minor Manual)

Dixon, R. M. W. [许帆婷 译] /15

一个与世隔绝、独特的民族——对宾夕法尼亚德语人的田野调查

(A Separate And Peculiar People — Fieldwork

And The Pennsylvania Germans)

Burridge, Kate [邓凤民 译] /45

语言是什么？为多样且不断变化的读者群而记录

(What Is A Language? Documentation For Diverse

And Evolving Audiences)

Mithun, Marianne [戴忠沛 译] /59

对尼日利亚戈麦人语言的田野调查：性质表达语法的发现

(Fieldwork Among The Goemai In Nigeria: Discovering

The Grammar Of Property Expressions)

Hellwig, Birgit [艾溢芳 译] /80

2 || 到田野去——语言学田野调查的方法与实践

田野语言学与生物学：如何科学地给动植物命名
(Field Linguistics Meets Biology: How To Obtain Scientific
Designations For Plant And Animal Names)

Fleck, David W. [蒋颖 译] /102

下 编

- | | |
|-------------------------|------------------|
| 汉语方言田野调查与音韵学 | 罗杰瑞/118 |
| 汉语方言调查和方言语音 | 王福堂/126 |
| 语言类型学/功能语言学派视野下的语言学田野调查 | 罗仁地/135 |
| 田野调查杂谈——语言调查的经历和几点体会 | 黄布凡/150 |
| 机助汉语方言田野调查系统 | 潘悟云、李龙/161 |
| 发音人的选择与合作 | 戴庆厦/167 |
| 回到我的拉祜村庄 | 马提索夫 [汪锋 译] /176 |
| 附录一 藏缅语调查词汇表 | /204 |
| 附录二 语法例句参考 | /233 |

语言学田野调查：代序

Alexandra Y. Aikhenvald

翻译：吴君如

提要：对于语言学这一基于经验的科学来说，语言学的田野调查是它的中枢。就了解人类语言、它们的结构属性与发生学关系而言，那些关于近乎未知的语言的第一手信息对我们至关重要。“融入式”田野调查（immersion fieldwork）是主要的必不可少的东西，相比之下“采访式”田野调查（interview fieldwork）是一个不那么值得推荐的选择。我们的目标是对每个语言作不受限制的记录工作（documentation），这项工作是为各种不同的听众准备的，既要易于理解又要易于掌握使用。这篇短文将介绍许多语言学田野调查方面的观点，本特辑的撰稿者们对此有更细致的讨论，他们个个都是非常经验的田野调查者，是他们所在领域中有名的权威。这就使得本文集非比寻常。

1. 关于本文集

就如何开展人类语言工作来说，掌握多样的语言和它们不同的结构的第一手知识是非常重要的。语言学田野调查——包括深入使用这种语言的社会，搜集信息，提供这种语言的全面分析和书面记录——是获得这个知识的关键。语言学田野调查也是很紧迫的事：再过几代，许多小小的“奇异”语言将湮没消亡，被国家语言（national language）和其他强势语言（majority language）所代替，那些语言更有威望，经济上也有优势。

如 Franz Boas（现代语言学奠基人）所说，语言之所以不同，不在于一个人可以说什么，而在于哪类信息必须表达出来：“语法……

决定每段经历中必须表达出来的那些方面。”(Boas 1938: 132)

要保证语言科学的进步, 要保证通过更多了解我们所知甚少的语言达到现代研究范式的改进和展开, 语言学田野调查是唯一的途径。例如, 只有通过研究南北美洲的一些语言, 语言学家们才认识到信息的来源——通常称为示证性(evidentiality)——可以是一个语言的核心范畴。一个中心波莫语(Central Pomo)(Mithun, 本书)使用者会很小心地使用示证词缀, 通过这个词缀他可以确保听者知道这个事件是他亲眼看见的还是从其他地方听说的。这在任何语言中都会是个有用的范畴——正如Boas(1942: 182)所说: “如果语言可以强迫报纸说出他们报道的是基于自身经历呢, 还是推测, 抑或道听途说, 那么我们就可以更满意地看我们的报纸了。”如果语言学田野调查者从未坚定地某个语言特征作为一个传统的话, 这个语言特征可能现在还不为我们这些语言学家所知, 上面就是一个例子。这一点很大程度上是由Boas自己发现的。

基于经验的语言学研究依靠的是作为田野调查成果获得的“活生生的语言资料”(Abbi 2001: 1)。田野语言学家为几乎各个语言学领域提供必不可少的输入, 包括语法理论、社会语言学、历史语言学和普遍语法。如果我们想“获得人类语言类型学上的所有可能性的全景图”(Dixon 1997: 144)的话, 语言的描写和分析是必不可少的。为了研究几种语言是否有亲缘关系和这种关系的实质是什么而对语言进行比较, 这种比较必须以完整的语法描写及有意义的字典为先决条件。

作为一个学科以及一门科学, 语言学依靠的是对第一手信息分析的结果, 而这信息是通过田野调查——语言学的中枢——获得的。为了把语言事实和类型学估计集合在一起, 类型学家们必须依靠不拘泥于任何时限的详细的语法描写。语言学田野调查也是“上手”学习这个学科的最好方式——如Dixon(本书)所说, “走出去, 干起来”。而且在一种新语言自己的语境中记录、学习、分析, 也是性上最让人激动和干劲十足的事业。尽管生活在一个未知的环境中可能带来一些物质条件上的困难、挫折, 有些时候甚至是危险, 但你生活在一个充满发现的漩涡之中, 忽然之间, 会灵光突现。这是在一个熟悉环境的“安

全区”里“安全舒适地存在”（本书作者 Burridge 所说）极难提供的。

几年之前田野调查还不流行。那些自称理论家的人（包括惯于分析二手资料的“扶手椅类型学家”们）觉得自己要高出那些出去干田野调查自己搞资料的人一等。Paul Newman (2003, 根据他 1998 的论文) 警告人们不要对非西方语言缺乏兴趣, 警告人们不要不愿承担田野调查。

而现在呢, 潮流似乎变了。越来越多的人试图研究之前没有描写过的语言。我们的语法大受欢迎, 我们的推论性概括正在帮助建立起新的语言学范式。20 世纪 90 年代初, 一个“扶手椅类型学家”可以轻易地对田野调查者说: “你拿资料来, 我们给你分析。”现如今, 十多年之后, 这个人可能会带点歉意地说: “你知道, 我现在也打算自己搞点田野调查了。”“蹲在自己的理论之茧里, 为了适应一些普遍假设和写博士论文重新分析资料”——用 Dixon (1977: xvii) 的话说——已经过时了。田野调查更重要了, 而且人们对怎样完成田野调查、田野调查的成果和那些搞田野调查的人越来越感兴趣了。

以上这些, 更加使得这一本集中讨论怎么做田野调查的书显得特别及时。所有文章都是由久负盛名的学者和顶级的田野调查者写的, 他们的专业领域包括澳大利亚土著语言 (Australian Aboriginal languages) (Dixon), 大洋洲和美拉尼西亚语 (Oceania and Melanesia) (Dixon 和我), 北美的土著语言和移民语言 (Mithun 和 Burridge), 南美语言 (Dixon, Fleck 和我), 非洲语言 (Hellwig)。

2. 田野调查：融入还是采访

理想的语言学田野调查包括在使用中观察这种语言, 成为社团的一员, 通常还包括被纳入亲属系统。一个人记录文本, 努力处理它们, 同时学说这种语言, 观察母语者 (native speaker) 怎么用, 在理想情况下观察各个年龄、社会群体的使用情况,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融入式田野调查” (immersion fieldwork) (Dixon, 本书)。这也是本书的所有作者在他们专攻的那门语言上所做的。

随着一种之前缺乏记载的语言走向灭亡，社会就会渐渐不再使用它，日常可能根本没有人说——仅仅被一些老人家记着，这样，参与者观察（participant-observation）——以及相应的融入式田野调查——就变得几乎不可能了。我们不得不做我们能做的，和“记忆者”（remembers）作“采访式”田野调查。这是澳大利亚和南北美洲的语言中经常发生的情况。这种研究虽然有用，但是和丰富翔实的多面性融入式田野调查相比，只限于获得有限的语法。那些从没有机会做真正的融入式田野调查的田野调查者们应该认识到他们的局限性，要克制自己以避免教导人家“怎么做”，也要避免对对象作出大而化之的论断。

在这个问题上，许多田野调查手册和百科全书里的文章都是由那些最多有点采访式田野调查经验的人做的。他们没有到那个社群去住上几个月，把自己融入到日常生活和日常语言的使用中去。让他们去教学生做他们自己都没干过的事更是不切实际了。

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采访式田野调查是合理的。如果有一个语言社团可用，那就是一个糟糕的选择了——可是一些研究者偏要选择那些可以方便找到的生活在城市或城镇的发音人做采访式田野调查。和一个生活在城市环境中的发音人一起工作，得到有几百万使用者的一种语言的语法，这语法本身可能很有趣，但是不太可能全面、可靠。一个重要的例子就是 Owens（1985）的奥罗莫（Oromo）语法^①（尽管 Owens 对阿拉伯方言的研究质量很高）。和移民社群合作——如果一种语言在祖国说得很好的话——也几乎是不明智的：许多语法特征倾向于在接触的诱导下改变，并且很可能在迎新弃旧的社会实践的冲击下变异。选择在大墨尔本、伦敦或者洛杉矶那些舒服的区域里研究缅甸语（Burmese）、苗语（Hmong^②）或塞尔维亚语（Serbian），或许对于理解英语环境对小语种的微妙影响很有帮助。但这仅限于给这种语言

① 译注：Oromo，即奥罗莫语，一种乌干达语言。

② 译注：Hmong 通常特指东南亚的苗族使用的语言，英文文献有时也把苗语都叫做 Hmong。

的结构作一个歪曲的描述。

当然，在一些情况下，因为内战或其他政治问题，研究者被禁止进入说那种语言的区域。现如今要研究者冒险进入恐怖分子控制的高加索地区是几乎不可行的。他也只好推迟计划好的田野调查，等到政治局势有所改善的时候。但同时，还有几千种他可以开展融入式田野调查的其他语言呢。

在一些传统做法里，“采访式”田野调查指一整组人到一个地方待一小段时间，本着“一人一个问题的”原则，飞快地采访同一群发音人。他们根本没时间语言学家和发音人之间建立一种融洽的关系。所建立的关系是“付费协助”而非文化上的合作关系。这样得出来的语法——其中一些已经出版——每个章节由不同的人完成——就像由互不相配的颜色缝缀起来的拼布作品。负责 X 章的语言学家 A 认为是连动式 (serial verbs) 的东西，语言学家 B 在他们的 Y 章里开开心心地描写成补语小句 (complement clauses)，诸如此类。

另一种在“采访式”田野调查中的玩忽职守的行为是不把语言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而只研究一个方面。“如果你想扩大关系小句 (relative clauses) 的资料库的话，就在你的两星期的假期里去问问”，这是一个“扶手椅类型学家”一次在网上发布的一条“建议”。“一个好的多面手语言学家” (Dixon, 本书) 会知道如果一个人想恰当地做好他的工作的话这是不可行的——毕竟每种语言都是一个 “système où tout se tient” (一个各个要素结合起来的系统)，引用 Antoine Meillet (1926: 16) 的著名论断，一种语言的任何部分都和其他部分有着内在联系。上述这种采访式田野调查的结果注定是有缺陷的。

田野调查课——如果引导得当的话 (Dixon, 本书) ——可以为准备进入真正的田野调查工作的人提供合理的背景训练。但即使是采访式田野调查，田野方法课也不能成为替代品。犯这样的错误，还在没有深入研究这种语言的情况下把田野调查课上的论文集结出版，这是一种非常可悲的玩忽职守行为。要知道可能正是这个语言再过五十到一百年就没有人说了，这样干不是近乎欺骗还能是什么呢？

一个真正的学者，真正的田野调查者，对这些问题都应该是诚实

的：来源，田野调查时间，他们接触了哪些类型的语言，语料库 (corpus) 的大小。最可靠的，把各种潜能都充分挖掘过的资料来自融入式田野调查。这种田野调查绝不可能是“一次性”过程 (cf. Newman & Ratliff 2001: 10)，相反，对于这种语言，对于说这种语言的人们，这是一个长期的，往往是终生的义务。本特辑的所有撰稿者们都有这个义务。

我们想要达到的最终目的是什么，我们如何下手去做？这是下面要讨论的。

3. 语言的记录工作、技术和科技

语言学田野调查的目标是记录一种语言。我们的语法“设计出来是为了提供一个永久的资料库，以记录人类交流的一个独特媒介，要是不把它记录下来，这媒介经历了语言灭绝 (language extinction) 或语言变化 (language change) 之后，未来的科学家们面对它将无从下手”，就像 Fleck 在他给他的 Matsés^① 语参考语法 (Fleck 即将出版) 的序言中所说的那样。

这种记录包括一个提供详细分析的语法。这个语法脱胎于有充分类型学考虑的基本语言学理论——“不依附于任何一个流行模型” (Krishnamurti)，而且在这个语法中标签不会代替分析，每一个决定都经过认真的权衡。我们同样致力于建立一个最大的精确词库，这个词库尽量多地包含能够得到的信息，还有文本集，可能还有教学材料 (因为那个社会希望这个东西能做出来)。

不同的听众看重不同的产品。许多说话者认为字典比语法更重要。但这并不是说参考语法除了对语言学者有用外对谁都没用。相反，Jovino Brito, Tariana 语联合会的主席，这种语言的高超使用者，得到一份 Tariana 语语法和其他材料之后对我说：“太好了，我的姐姐。现在我们有一个真的语言了，有一本语法书，一个字典，一本手册，还有

① 南美印第安人，通常写作 Matsés。

一本故事书。”

换句话说，用 Mithun 的说法，合适的语言记录包括“按照日常对话、正式讲演等不同情景中说话者的使用情况记录语言”。她还说，“特别是那些濒危语言。现在记录的濒危语言以后会用于我们现在意想不到的用途”。Mithun 就已经调查了各种美国原住民社群。在一些社群里，濒危语言还在活跃地使用着；而在另一些社群里，一些濒危语言只存在于少数老人口中。在 Barbareño Chumash 社群中只有这语言的最后一个使用者的后裔健在。既然他们有兴趣更多地了解他们已然灭绝的作为认同标志的语言，他们就想方设法回忆谈话传统和使用这种语言的其他方式。非常不幸，虽然这类东西非常丰富，却并没有在现存材料中保存下来。对于那些还有人说的语言来说，语言学家能够提供不受限制的记录——现在我们记录得越多，未来出现的问题就越少。

现代科技，尤其是录音设备，可以让我们“实时记录自然的，没有经过转写的话语”（Mithun，本书），这很有帮助。得益于科技进步，我们的资料和分析更为精确。在使用更精确的传统方法的同时使用视频剪辑使 Hellwig（本书）改进了她对 Goemai 领属表达（property concepts）的理解，那是一个之前没有记录的尼日利亚乍得语族（Chadic language）。

尽管如此，科技应该被视为手段而非结果本身。科技如果被滥用，如果被过度地信任，奇迹也会变成一把双刃剑。如 Dixon（本书）所说：“当工作者离开田野调查地回到基地处理资料的时候，计算机是很有价值的。”在调查地带上一台电脑可能有帮助，但同时也伴随着风险：照顾电脑可能会痛苦地占用本可以用来分析语言的时间。在潮湿的热带地区——如西北亚马逊（Amazonia）和萨皮克河（Sepik）流域，没有电——一台电脑可能变成一个负担。录像机也是一样。我们也该想想那些之前没有记录的语言的使用者们，他们住在偏远的地区，或许会被那闪闪发光的小玩意儿吓到。录像机或电脑的持续存在可能没什么用，只会使田野调查者和他们试图融入的社群关系疏远。

甚至一台录音机也会成为一个不受欢迎的入侵者。Burrige（本

书) 讨论的一些门诺派教徒 (Mennonites)^① “显然对任何形式的录制都很不舒服”, 那么最好的过程就是不要去“推动这件事”。用 Burrige 的话说, “伴随研究最好不受录制设备的干扰”, 尤其是在“特别不合时宜技术花招的场景下”。当我们不用总是照顾仪器的时候, 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语言结构的社会文化语境”。

这完全是常识——但或许有点“不酷”, 不时髦。近来, 许多语言学家——在严格意义上, 他们中没有一个记录过一个活的语言, 或许, 根本没有能力这样做——引入了一个虚假的区别, 他们所避免的“描写”(description) 和他们热烈欢迎的“记录”(documentation) 之间的区别。在他们看来, 包括我们(本书的所有供稿者), “描写”是“记录一种语言”的东西, 即提供全面的语法、词典和文集。对他们而言, “记录”包括建网站, 网站上放着文本材料, 以及录像链接。他们看不起“编辑语法和词典”, 而后者至今一直是, 以后也还将作为一门科学, 成为语言学的基础。

毫无疑问, 把对话、短文以及其他信息放到网上, 制作录像和其他基于网络的成果, 这很得喜欢电脑的语言学家同事们的欢心。但缺乏恰当语法词汇分析的材料对语言学后进和说这种语言的人自己都是没什么用的。一方面, 我们只能祈祷电脑资料库能存在超过数年的时间; 而书却能存在几个世纪。整理基于网络的资料可能比辛辛苦苦写本语法再写本相应的词典更快更容易, 但网络上的成果需要不断更新, 书却不用。而且如果这种语言是在偏远的社群里使用, 比如亚马逊、非洲或者新几内亚, 一个网站对他们有什么用呢? 正如一位欧洲的同事提醒我的一样, 现如今集中在计算机基础上的“记录”类似于种族主义和“新殖民主义”, 使得“有余者”和“不足者”之间的鸿沟越来越深。Leo Yabwi, 新几内亚 Sepik 地区 Avatip 说 Manambu 语的村庄的一位地方学校校长, 他同意这个观点: “我们需要书。电脑对我们的孩子有什么用? 他们要学习他们的遗产, 而不是电脑游戏。”

^① Mennonites 门诺教徒, 16 世纪起源于荷兰的基督教新派, 反对婴儿洗礼, 服兵役等, 衣着朴素, 生活节俭。

他说对了一点：我们不应该忘记，一种语言的使用者和科技接触得越多，他们的语言被权威语言、“全球化”、通讯手段灭绝的危险就越大。让我们再次引用 Dixon (1997: 144) 的话：“计算机技术的‘顾影自怜’可以先等等，语言学描写现在就得做。”

要充分理解一种语言，语言学家不能仅仅是一名语言学者。Burridge (本书) 清晰地提出了这个观点：“但是我很快发现如果忽视社会文化信息的话，我的语法描写会有多么不合适。甚至在中古荷兰语 (Middle - Dutch) 上的初步尝试也教了我那么多东西。在保守的门诺教徒看来，他们生活的每一方面都浸透了符号，那些符号是对某些品质的义务的表达，这些品质包括如简朴、平等、谦卑，以及特别是个人对上帝意志的服从。这些服从的符号体现在他们词汇的形式上，也深深嵌入了这种语言的语法结构。”我们常常最后以写民族志结束，把它作为我们语言学家工作“之外”的工作（对 Dixon 1991 和 Aikhenvald 1999 的介绍就是例子）。并且，如 Fleck 在本书中的那部分所展示的，一个有机会获得坚实生物学基础的语言学家是走在许多同事前面的。

融入式田野调查，研究者成为一个社群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用 Burridge 的话说，提供“观察这种语言运作的宝贵机会”，同时也是不这样做根本没有可能得到的一个“和这种语言亲密接触的机会”。但是这样做也会有副作用。

一方面，我们的发音人是朋友，甚至接纳你为家人；另一方面，我们是语言学家，几乎无法掩饰我们的研究者身份。再一次引用 Burridge 的话：“当说话者称为朋友而非仅仅是信息来源时，保持不偏不倚的观察者身份就越来越困难。”一个人可以多大程度地允许自己成为被描写语言使用者的一员？融入西北亚马逊的圣罗莎河 (Santa Rosa) 的 Tariana 社群，融入新几内亚 Avatip 的 Manambu 社群对我来说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收养”家庭的纽带带来道德和经济的义务，甚至妨碍进一步研究：因为想要和“说得不正确”的另一个群体合作，我遭到我的 Tariana 家人严厉的批评。尽管如此，就像我们和“真正的家人”住在一起一样，不管他们多么不好，我们对我们的田野调

查环境照单全收，尽量应用。

和一个或多个发音人的密切的个人关系加强一种“无价的文化合作关系”（Dixon，本书）。就如 Burridge 评价她的发音人朋友时所说（本书）：“甚至在我自己想出来之前就她知道我要问什么。”这样的发音人就像我们写语法的合著者一样好，而且确实是共同做分析的人。

学会那种语言、记录并分析文本与对话是一个好的田野调查者的渴望。通过“询问怎么把句子从混合语（lingua franca）翻译过来”（Dixon，本书），我们永远也发现不了“这种（少数民族）语言与侵蚀它的语言不同的独特特征”（Mithun，本书）。对于高度受影响的语言（fusional languages），如达罗毗荼语，通过这种语言本身作的有限的范式诱导是非常重要的。但如果我们想要实现这样一个目标，即“为后世的语言学家和社群记录语言”（Mithun，本书）的话，我们需要了解特殊的语法和特殊的词汇，它们只能通过“自然的没有脚本的言语”发现——那时候出现的句型在例句翻译中可能丢失。如 Mithun（本书）所说，“从一种接触语言翻译过来的例句可能会方便语言间的直接比较”，但这种比较不会揭示多少小语言容易在翻译中“丢失”的基本特征。我们不会学到多少超出我们已有知识的东西，也几乎无法“窥见这种语言的‘特质’”（见 Hellwig，本书）。

基于实地调查的语料库（field-based corpora）不能回答所有问题，进一步的分析工具可能涉及录像诱导、图画故事和通过那种语言本身进行集中诱导（见 Hellwig，本书）。但这些相对于自然文本和对话——“语言学田野调查的生命之源”（Dixon，本书）还是位居第二的。

4. 巩固经验：本书概述

本特辑由六个部分组成，每部分都是由一个能力很强又很有经验的田野调查者撰写，这个人在语法、语言类型学和历史语言学同时也是卓越的专家——在这些领域中 Dixon、Mithun 和 Burridge 都是家喻户晓的人物。这个作品以 R. M. W. Dixon 的《田野语言学：微型手册》